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三十一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山西新军史略

苗长青 著

抗战爆发后，在三晋大地迅速崛起一支崭新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在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中，山西新军不断发展壮大，在八年抗战中，创造了辉煌的战绩，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责任编辑：刘冬梅

郭红娟

复 审：张静华

终 审：严果生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31辑)

山西新军史略

苗长青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625 字数：300千字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978-7-900454-34-8
G·142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领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璧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钟声扬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士星
郭双威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敌人打到娘子关”	(1)
二、薄一波回山西	(5)
三、接办和改组牺盟会	(9)
四、培训抗日救亡干部	(12)
五、抗敌决死队的成立	(17)
六、战斗中成长	(20)
七、“勇敢深入敌后方”	(28)
八、与反共投降逆流作斗争	(33)
九、粉碎“十二月事变”	(41)
十、踏上新的征程	(53)

引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三晋大地迅速崛起一支崭新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

在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中，山西新军不断发展壮大。到1939年夏，山西新军主力部队发展到约5万人，实际兵力和武器装备数量都超过了阎锡山的山西旧军，加上地方武装，达到近10万人。

在8年抗战中，山西新军对敌作战5000余次，毙伤日伪军4万多人，有1万余名将士英勇牺牲，创造了辉煌战绩，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山西新军中，先后涌现出县团级干部5000余人，省军级干部500余人，有70位将领被授予将军军衔，其中上将1位，中将3位，少将66位。从一支地方部队中走出了70位将军，创造了我军军史上的一个奇迹。

一、“敌人打到娘子关”

群雁飞，汾水寒，

敌人打到娘子关。

坏官旧军齐逃跑，

留下人民受苦难。

太原失守，临汾沦陷，
风陵渡边起狼烟。
万千同胞无家归，
父子流散泪涟涟。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三晋大地上广泛传唱的一部大合唱——《牺盟大合唱》中的一段歌词。这部大合唱讴歌了在党的领导下，山西人民组织牺盟会，创建新军，英勇抗战的故事。

山西新军诞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

(一)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下，日本帝国主义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不久，日军的铁蹄便踏进了山西。

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步步进逼，是抗日武装——山西新军创建的最基本的历史背景。

(二) 晋绥军无力担当保卫三晋重任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山西地方实力派的阎锡山，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投降，二是抵抗。

对于投降，阎锡山是不甘心的。薄一波同志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一书中曾这样分析说：

1935年华北事变后，阎锡山在晋绥首当其冲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眼见自己苦心经营20多年的基业行将不保，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日的态度。这

可是一份巨大的基业。现代化大企业包括轻重工业约有 50 余家；铁路除正太铁路外，又修通了贯通山西南北的同蒲路；军工企业不仅能制造轻武器，还能制造八野炮等重武器；此外还有经营煤炭的“山西保晋公司”和“戒烟药饼”（实为大烟土）制作所，等等。金融事业也是独立的，自己发行货币，法币是收集起来当外币用的。总之，阎氏家族的财产和他们所控制的经济利益都在山西，搬不走，挪不动，岂能拱手让人！阎对部下说：“你们看看九一八后的东三省和现在的察北吧！在这种情势下，要想叫自己的财产不让人抢走，除非这一块土地上的人都起来抵抗死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于是，阎锡山选择了抵抗。然而，阎锡山的晋绥军根本无法抵挡日军对山西的进攻。面对武装到牙齿而又异常凶残的日军，阎锡山深感前途堪忧。这是阎锡山同意和决定组建山西新军的又一重要的背景和原因。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这一重大变化，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呼吁两党合作，停止内战，

致抗日。此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大量工作。

中共中央对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地区性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予以特别的重视。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利用在东征中被俘的晋绥军团长郭登瀛遣返山西的机会，托他给阎锡山捎去一信，做阎锡山的工作。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派中共中央北方联络局书记彭雪枫携其手书赴绥见绥远省主席、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11月12日，彭雪枫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秘密进驻太原，开始与阎锡山当局直接谈判。

11月14日，绥东战事爆发，毛泽东派王世英赴晋，协同彭雪枫与阎锡山谈判。

对于共产党，阎锡山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在红军刚到陕北和红军东征期间，他是反对共产党的。红军东征结束后，由阎锡山请来的蒋介石的10个师10万中央军赖在山西不走，而且，利诱一些晋绥将领背叛阎锡山，这就使阎锡山开始忧虑“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步步进逼。这样，在共产党一再向他抛出橄榄枝的情况下，他就逐步产生了联共、拒蒋、抗日的想法。阎锡山曾说：“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利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可能抵制日本和蒋介石。”

“七七”事变后，阎锡山正式给毛泽东复信，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1937年7月31日，阎锡山当局通知彭雪枫：自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

公开进行活动。8月10日，毛泽东指示彭雪枫在山西设立办事处。至此，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当局合作抗日的关系正式确立。

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当局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为组建山西新军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薄一波回山西

薄一波在1979年9月12日的一份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

1936年秋，当红军退过黄河，山西抗日运动高涨，阎锡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阎锡山为了维持其统治，提出所谓“联共”、“抗日”的新政策，实际上接受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标榜进步，大批招致进步人士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赴晋工作，这就造成了我党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利条件。

薄一波就是当时被阎锡山“招致”“赴晋工作”的共产党人之一。

关于阎锡山邀请薄一波回山西的情况，薄一波自己曾在一篇《回忆山西新军》的文章中有一个回忆，他说：

我了解到，阎锡山之所以邀我回山西工作，除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个主要因素之外，他的亲信赵戴文、赵丕廉和梁化之的推荐起了重要作用。

用。二赵是我在山西国民师范读书时的前后任校长，梁是我的同乡和高我两年级的高小同学。阎的封建意识极浓，素重乡土、师生等关系。赵戴文、赵丕廉、梁化之也是这样。所以，他们一再建议邀我回来“帮助阎先生做点事”，其中梁化之更为积极。

当阎锡山决定邀请薄一波的时候，薄一波等人正在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正在为他们出狱办理相关手续。

1936年9月23日，薄一波的同学，时任山西工人委员会主任干事、山西训导院教管主任的郭挺一受阎锡山的委托，拿着阎锡山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和给薄一波的亲笔信，携带重金，来到北京，营救薄一波。

郭挺一见到薄一波后说，阎先生派我来营救你，请你回晋“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说，这件事，由我来做不合适。我在外面搞了这么多年，在山西又曾两次被通缉。对阎锡山这个人，我不感兴趣。

出狱后，刑西萍（徐冰）负责与薄一波接头和联系。有一次，薄一波谈到阎锡山邀请他回晋工作的事。刑西萍马上把这一情况向刘少奇做了汇报。刘少奇说，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北方局刚刚收到陕北来电，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提到，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我们却拒绝不去。他要求薄一波回山西去，开展与阎锡山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刑西萍把刘少奇的这番话转告薄一波。薄一波说：我

不愿意回山西工作，主要是不愿和阎锡山这样的人共事，何况郭挺一已经知道我仍是共产党员。刑西萍听了他的话，再次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一听就火了，说：“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彻底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和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这是新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会就学，到工作中去学。阎锡山正因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才会对你这样欢迎嘛。”

这样，薄一波就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山西。在山西，他考察了 40 多天，接触了山西各界许多人。经过考察，薄一波认为，山西确已形成可以推动阎锡山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利形势。在山西确实可以大有作为。

刘少奇决定，薄一波尽快返回山西，并要薄一波从刚出狱的同志中选几个同行。薄一波选了杨献珍、董天知、韩钧 3 人，周仲英也想去，就成了 4 人。

离平赴晋前，刑西萍向薄一波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根据薄一波回忆，主要是 3 点：一是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关门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二是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做“清客”，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是由薄一波、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 5 人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只作公开工作、合法工作。这个组织绝对保密，不对外，不能发文件，可开会，也可不开，因为阎锡山请的是薄一波，实际上就是通过以薄一波的

名义来进行工作，因此就是由薄一波领导。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中共山西省临时委员会，由张友清任书记。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各搞各的，不发生横的关系。

1936年11月3日，薄一波等人到达太原。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郭挺一已在火车站迎接。第二天，阎锡山就将薄一波请到省政府东花园的参事室，在赵戴文、梁化之的陪同下，与薄一波进行了会谈。对于这次谈话，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这是第一次会见和谈话，今天回忆起来，还感到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见面稍事寒暄之后，我就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能回来在阎先生领导下做点事情，很高兴。山西对我有两道通缉令……”梁化之马上打断了我的话，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不‘通缉’，不就请到了吗？”赵是我的老师，梁是我高小时的同学，都比较熟悉。阎对我也是心中有数的，特别是知道我是真共产党员之后，更是高兴，所以谈得非常之好，无拘无束，而又严肃认真。我说：“我愿意在阎主任领导下工作，是做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们家乡（阎和赵是五台人，我和梁是定襄人，我家和阎家、梁家又是邻村）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有几点情况我想需要说清楚，然后好共事。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是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

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是共产党人。”

阎一一表示同意。赵插了一句：“一波，道理全都你占了，我也提一条：在山西省政府里、军队里，你不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我回答：“可以保证不发展。”有意思，这同北方局对“公开工委”的决定恰好一样。这个“约法三章”，为我们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合法的依据。我们和阎锡山建立的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就这样开始了。

在这次会谈中，阎锡山决定，让薄一波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到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任常务秘书并主持日常工作。

三、接办和改组牺盟会

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最初是由阎锡山的核心组织“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杜任之、戎子和、刘玉衡等人倡议和发起，并得到阎锡山的批准和支持成立的，是一个官办的群众性抗日组织，由阎锡山任会长，阎锡山的表侄、机要秘书梁化之任总干事。

1936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筹备会宣告成立。10月18日，筹备会在

太原海子边公园举行了隆重的宣传大会。据当时的《太原日报》报道，这天的大会，“参加万人，激昂慷慨，空前未有，闻者发愤，参加者有洋车夫、农夫、工商学各界人士，前来者络绎不绝，至终场没有早退的。”会上宣读了《告同胞书》，会后还向全国各地和海外同胞发了通电：

看看我们的领土，一天天缩小；看看我们的同胞，任意被人践踏宰割；看看我们的财产，一批批被侵略者拿去。从“九一八”以来，我们丧失了二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等于日、英、法、德、意、奥、匈、比、荷、瑞士等国面积的总和，人口的损失是五千五百万，等于日本人口的一半，单指“一二八”的损失是两万万元，走私以来税收的减少也在一万万元以上。同胞们，这是多么惨痛的事情啊！我们不只是感觉惨痛，我们更感觉侵略者的野心没有止境，“不抵抗主义”丧失了四省，“睦邻”、“友谊”又丢了冀东，我们一心一意希望和平，而侵略者却抱之以洋洋得意的进攻，快到我们晋绥的头上。同胞们，和平确已到了绝望的时候，牺牲确已到了最后的关头，谁又被人打了左脸又给右脸，谁甘心眼睁睁让人宰割。同胞们，奋斗当在未亡之前，牺牲当在敌人未至之时，我们与其不战而死，何如奋斗求生。我们应该牺牲我们过去的成见，大家团结起来，把我们的力量用到救亡的奋斗上。同胞们，起来，起来，一起武装起来，宁做战死的烈士，不做亡国的奴隶，我们要枪口一致对

外，我们的商人不售私货，我们官民不做汉奸，这是我们坚决的要求，谁敢冒犯我们的要求就是民族的大敌。

这次大会的召开和《告同胞书》的发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不断有函电发来，表示热烈支持。

但是，牺盟会的成立，却引起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中央政府的震怒。日本政府发出外交照会，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追查。山西的反共顽固势力也把阎锡山包围起来，对他说：那些青年胡闹，给你闯了乱子！并乘机要求取缔牺盟会。

阎锡山一看这种情况，便产生了疑惧。他训斥其左右说：纲领和宣言念给他听时，他正在打瞌睡。随后，在他的授意下，于 10 月 20 日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称：牺盟会的“所有宣言及工作纲领，仅一二发起人之个人意见，未经会议通过”。这样，牺盟会刚刚成立，工作就被迫停顿下来。

薄一波接管和主持牺盟会工作后，立即着手对该组织进行改组。

改组工作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改组领导班子。在牺盟总会的常委中，新增加了薄一波、董天知、韩钧 3 名共产党员；健全了各级组织机构，扩充了革命力量。从而确立了党对牺盟会的坚强领导，逐步把牺盟会改组成一个由“共产党实际领导的、与阎锡山合作的抗日救亡组织”。

二是修改纲领。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以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为依据，按照山西的实际，制定了新的纲领。这个新纲领修改了过去过左的提法，使用了阎锡山惯用的语言，促进了阎锡山集团的抗战和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对牺盟会的改组为山西新军的创建创造了条件。

薄一波接管和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以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又陆续派来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傅雨田、刘亚雄、谷景生等十几位富有白区工作经验的同志（前 8 位同志都是从草炭子监狱出来的）到牺盟会工作。随后，为了适应阎锡山在用人问题上的特点，北方局又挑选了牛荫冠等一批山西籍的同志回到山西工作。

四、培训抗日救亡干部

牺盟总会改组后不久，阎锡山召开了过一次高干会议。在会上，阎锡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让大家讨论和回答。会议连续开了几天，大家发表了不少意见，但阎锡山一直不表态。

经过中共山西省公开工委研究后，认为阎锡山可能是想扩军，遂决定由董天知试探。董在一次会上发言提出，日军步步进逼，晋绥首当其冲，不早作准备，将来必吃大亏。不成立一支以保卫桑梓为宗旨的强大军队，就不足以抵抗

日本入侵。因此，像阎会长讲的，发展 30 万国民军是当务之急。董天知的这一席话讲对了，阎锡山听了没有说话，却掩饰不住高兴的神色。他回去后，对赵戴文、梁化之说：“共产党里就是有人才，董天知那么年轻，就能提出那么好的意见，了不起！”

会后，阎锡山就把“招兵”的任务交给了牺盟会，并把负责培训军政干部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也实际交给牺盟会领导。此后，牺盟会便立即投入到大规模的干部培训工作中去。

1936 年 12 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牺盟会及时地向全省及平、津、沪、鄂、冀、豫、川、粤等省发出公告，欢迎爱国青年前来太原接受军政训练。负责白区工作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也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市党委在组织抗日青年去延安的同时，也可以组织去太原。这样，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便成批成批地涌到太原来，甚至有一些海外华侨青年，也飘洋过海，不远万里前来。中共北平市委一次就组织了 300 多名中等及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知识青年前来太原。全国各地先后有近 3 万名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前来太原，接受抗日训练。牺盟会主要举办了 5 种培训班。

（一）军政训练班

军政训练班是军政训练委员会训练军政干部的直属机构，创建于 1936 年 9 月。1936 年 11 月薄一波主持牺盟会后，于 1937 年春把冲锋上士班的原班人马改编为军政训练班一、二、三、四连。之后，随着各地前来太原接受抗日训练的人数不断增加，又陆续成立了五、六、七、八、九、十、十一、